

荆花馆日记

上册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荆花馆日记

(上册)

〔清〕王庆云 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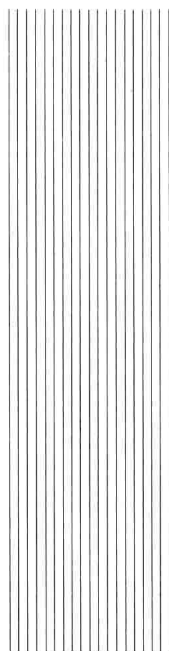
点校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五年·北京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任	戴逸
执行主任	马大正
委员	卜键
	朱诚如
	成崇德
	郭成康
学术秘书	潘振平
	徐兆仁
	邹爱莲
	赫晓琳
	李岚



王庆云画像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

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有《重修清史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

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嫔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皮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湮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被英法联军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牋、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

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义》、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

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二〇〇四年

王庆云与《荆花馆日记》

李学通

《荆花馆日记》，又名《王文勤公日记》，作者为晚清著名督抚王庆云。其记述起自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迄同治元年二月，其中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以后为其子传璨追记。

王庆云，字家瓖，又字贤关，初号乐一，又号雁汀，福建闽县人，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二月二十九日，卒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七日。

据说其祖上业贾，家境曾经富饶，但到王庆云出生时，已家道衰落，生计窘迫。王庆云5岁入塾启蒙，因家中无力延聘塾师，只好附学于伯姑林姓婆家。嘉庆二十一年（1816），19岁，入县学，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人。自得中秀才之后的十年中，“门庭豫顺，食指渐繁”，王庆云与兄弟三人先后于白石头乡叶家、程家开馆授徒，“以馆谷持家”。馆课之暇，约期归省，煮茗浮白，承膝下欢。期间，先后于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二年、三年、六年、九年北上赴京应礼部试。公车五上，终于道光九年获中贡士第五十六名，殿试二甲第二十名，赐进士出身；朝考获第十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留馆，授编修，这一年他35岁。

在翰林院时期，王庆云曾于道光十四年奉命典试广西，任正考官。十七年初，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协修，同年八月，出任贵州学政。履黔三年，王庆云以振兴边疆地区教育为己任，激励实学，优加奖赏。他与清未经世学派代表人物、《经世文编》编者、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

(藕庚)最为投契，还对《经世文编》有关林则徐湖广盐漕的奏折及各省有关时务的奏疏，亲手整理补充。

道光二十一年回京后，他先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纂修。二十六年，始充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这期间实有二十二至二十五年计四年是丁忧在籍。二十七年五月，翰詹大考中，王庆云以诗、赋、楷法俱佳，列名第一，蒙道光帝召见并授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翌年，转侍讲学士。二十九年，又升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年，咸丰帝即位后，命大臣保荐人才。王庆云得到好友礼部侍郎曾国藩的举荐，诏擢詹事府詹事，又署理顺天府府尹。咸丰元年五月，授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署顺天府尹。咸丰二年，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作为经世派官员，王庆云通知时事，于财政问题尤为留心。在户部二年有余的任职期间，穷其利病，稽核出入，查出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计九百三十六万两。特别是在清廷财政艰困的背景下，王庆云尝参与行钞、铸大钱等问题的讨论和设计。

咸丰三年，王庆云外放陕西巡抚，四年末调补山西巡抚，七年六月出任四川总督。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用兵东南，财政日形支绌。王庆云由户部侍郎而转任地方督抚，于中央财政窘况知之甚明。他在任督抚期间，特别是在晋三年，于地方财政税赋多所兴革，解京内外协济各饷逾千万，地丁不足，佐以盐课、捐输，竭力催提。督川期间，王庆云一方面巡阅营伍，剿匪缉盗，力行保甲团练，同时积极筹办条粮津贴、楚盐抽厘并江西、湖广捐输，以备拨解。八年兼署成都将军。

咸丰九年四月，英、法联军侵华日亟，咸丰帝以王庆云“平日办事精细，心地和平，必能驯扰外夷，安定民心，操纵得宜”，特调其出任两广总督。七月，王庆云自成都登舟出川。因忧念大沽警报、广东海防，内心焦虑，行至湖北，旧病复发，即借住汉阳，请假调理，一月后具折请辞。九月十二日奉上谕，准其开缺。年末王庆云至西安，次年四月渡黄河，侨居山西汾州。十一年九月，同治帝登基前一日，降旨征召起用祁隽藻、翁心存、罗惇衍等退闲官员，授王庆云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又于十二月十七日改授工部尚书。

虽病体日羸，请假调养，行期屡改，王庆云仍欲力疾赴召，却于起程前一日即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病歿山西汾州，赐谥“文勤”。同治三年，山西在籍绅士合词请入祀山西名宦祠，奉旨依议。同治八年，归葬福州西门芋坑山。

二

王庆云闽县祖居旁，有屋三楹，曰荆花馆。王庆云丁忧期间曾在此读书课子，随手所得，笔为札记，并有《荆花馆遗诗》存世，故其所遗日记亦以“荆花馆”题名。

由于王庆云勤于记述，“日有恒业，夜则记日间所事，以自考镜”，故留下这部总数约八十余万字的《荆花馆日记》。该日记从王庆云道光二十六年服阙期满、返京任职记起，至同治元年病逝止，共十六年。其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他本人担任户部侍郎、顺天府尹，以及出任秦、晋两省巡抚、四川总督期间，办理中央财政情形和地方重要政务实情，包括觐见奏对，朋僚交游，租房借债，求医问药，以及赴任、出巡、沿途所见山川形胜、风土民情和与友人来往函札、诗文等，也包括清廷的各种仪注（如召见、入值、迎驾、陪祭、葬礼等）、科场试事，等等。所记或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见于邸报、上谕、廷寄、奏章，或从与人交谈、往来书信中获得的信息。除记述事实外，也记录了王庆云本人对事情的看法主张和对人物的臧否。

由于职务和任职地区的不同，《荆花馆日记》所记的内容也各有特点。前一阶段即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三年，王庆云自言“起家词馆，两权京兆，三载农司”^①，因此《日记》中的京官生活，多为在翰林院读书修史，以及参与户部理财活动、处理顺天府地方事务情形；咸丰三年至九年的后一阶段地方督抚生活，重点在地方筹款、劝捐、吏治、防务等，而于国之大事，如清军和太平军、捻军的交战情况，列强侵华活动，则始终均有述及。现将相关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① 日记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以下所引均为日记所记。

（一）翰林生活：与林则徐、曾国藩的交往

道光二十六年返京任职后，王庆云初在翰林院国史馆读书修史，虽然在八月十二日“派署提调”，实际主持国史馆工作，但相对后期职务而言工作尚属清闲，生活也堪称清贫。每日所记多为日常的读书写作生活，师友朋僚间的交游酬应，吟诗习字情形，与家乡的书信往还，甚至看病吃药的方剂。这些都为我们了解清代京官、翰林的生活提供了颇为具体而详实的样本资料，同时也为相关人物的研究提供了颇为有价值的线索。如：

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全天活动如下：

早，进天安门朝房，磨勘顺天卷，分得七本多七签，少三签，中刘翰清卷佳，二场尤好。午正至馆，校进呈冬季传四篇、吴师传一篇。尚有穆师官衔未上。供事张叔瑾，撤承发一年。晚，邀古樵、吉甫昆季及薇堂小饮。子贞适来，入座颇酣。

这一时期，王庆云交游范围主要以在京的福建同乡、乡试会试同年为核心，也有一些京官同僚。其中包括林则徐（少穆）、林镜帆（林则徐哲嗣）、沈葆楨（幼丹）、何秋涛（愿船）、何绍基（子贞）、毛鸿宾（翊云）等，而且与礼部侍郎曾国藩（涤生）、大理寺卿倭仁（艮峰），以及御史季芝昌（仙九）、袁甲三（午桥）等也交往颇多。如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记有：

晚，邀子贞星使及郑小山、沈幼丹、何愿船雅集。

日记中提及林则徐的地方有 20 余处，主要是书信往来。例如：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廿三日：

奉到少穆前辈手翰，并委书都匀陶济园封翁家传。来信勉以文章事业，毋徒以笔陈图作铁门限……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七日：

少穆前辈书来，以洱茶为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引疾开缺回乡后，王庆云等积极主张和支持林则徐再度出山。道光三十年三月

三十日，他先是“致林镜帆书，为少穆先生劝驾”，未见效果。五月，咸丰帝下登极求贤诏。经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等举荐，清廷命转饬林则徐“迅速北上，听候简用，毋稍延缓”。

七月初六日，王庆云“闻少穆先生尚未应诏束装，拟为劝驾之书”，此次又因故未果。王庆云仍不甘心，在八月初三日收到林则徐来函之后，又于次日的复函中再次劝驾，并在日记中保留下了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内容：

出则当肩其事，而为公难者。世间无易就之业，亦无必不可成之功，视其人方略何如耳。此事从来如三年之艾。今上春秋鼎盛，必不责效目前，但使审度形势，专一事权，终当收无穷之利。且都人士喁望之情，与九重侧席之意，正以需人，担荷时艰，若人尽畏难，谁与共济？

此函与林则徐十月最终接受钦差任命，再次出山或许不无关系。

王庆云与曾国藩的交往，也是《荆花馆日记》中引人关注的内容之一。日记中最早有关曾国藩的记载为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的曾国藩，与王庆云被分派为当年武会试的正副考官，二人因工作关系相识，此后惺惺相惜，相互引为知己，交往日益频繁。

曾国藩对王庆云颇为看重。咸丰帝登基后，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三月在应诏陈言折中，主张用人、行政二者并重，同时举荐时任通政使司副使的王庆云^①。据《荆花馆日记》三月十八日所载：

赴园复命。晤涤生，以保举告。予谓前已有信坚却，何尚尔耶。答以非为进讲，因于掌中书封字相示。问以折子递未，曰已进矣。为愕然久之。回朝房告敬堂，则曰此不必辞。进城，晤艮峰，又曰当勉力以答知己。闻前数日涤生与艮峰、敬堂议及此事，乃悟此举固出涤生，至诚二公亦尝赞之，故更不踌躇也。

王庆云对曾国藩也极为欣赏。同月二十六日《荆花馆日记》有记：

涤生任事之勇、与人之一，余所不及。

^① 《曾文正公年谱》。

王、曾二人由公交而私谊，交往日密。例如，曾国藩见王庆云常赴圆明园直日，而车马不济，往来“车中颠簸颇乏”，遂于以辕骡相赠。据《荆花馆日记》咸丰元年七月十七日记：

涤生送来辕骡一匹。

咸丰二年曾国藩丁忧回籍，王庆云身膺户部侍郎兼顺天府尹重任，公事猬集，二人也时常函札往来。面对漕运、海运同僚纷争如讼的乱象，王庆云不禁慨叹：“河漕大局，惟涤生可与议此，而今又契阔，环顾喟然。”十月十六日作书与曾国藩，书中有云：

偶有疑难，思欲商度，环顾喟然。此景此情，非寻常朋友离索之比，又不敢轻以语人，惟兄能共喻之也。

此后曾国藩在乡组织湘军，率军在前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王庆云则出任陕西、山西等地督抚，实际担任起在后方为清廷筹济饷源的重任。虽然二人此后再未谋面，但关系却更加紧密。据《荆花馆日记》咸丰四年九月初五日载：

致涤生书，良友久别，刺刺不能自休。

而且这种联系也变得更为重要——关系朝廷安危。同月二十九日日记：

得涤生九月望日书。前在衡州造船募勇，未毕而贼至，有宁乡之胜，旋败于岳州。贼以大股南犯，再胜之于湘南，而复有靖江之失。于是常、澧被掠，窥长沙愈急。近者岳州十三战仅败一次，余皆全胜。转战而前，克复武汉，事机凑泊，有不尽由人力者。现在贼退靳、黄已下，须趁势追剿云云。因与子临书，言：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长江数百里，涤生以孤军深入，以后解饷，难于今日云云。读涤生奏稿，须眉毕现，使人勃勃有生气，惜字多未及发抄，使人人共见。

王庆云以此项饷需尤关全局，遂移缓就急，停支本省兵饷等款，先行解往前线备用。在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如果没有王庆云从晋陕两地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其结局是不可想象的。这其中首先是源于王庆云“吾辈为国家典守财赋，遇此得力之兵，而不络绎饷馈，可云辜负”的政治自觉，当然也包含着他与曾国藩惺惺相惜的私人交谊。

《荆花馆日记》中，涉及曾国藩的内容总计约有200余处，也为曾国藩研究提供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资料。

（二）政事公务：从侍郎到督抚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史料价值之所以较高，一则因为他两权京兆，三载农司，历任秦、晋、蜀三省督抚，职务重要，履历丰富；二则由于他勤于著述，记载详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政事公务都有记录。日记中保留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据粗略统计，《荆花馆日记》一天所记最多者有800余字。有些重要活动，如皇帝召见，“退则记天语于册，以识不忘”^①，而且记录颇为详细。

例如，王庆云道光二十七年得获翰詹大考第一，五月十六日在圆明园受道光皇帝单独召见：

子初即起，丑正到园。出门雨甚，将至园放月，旋晴。至朝房具服，复至吏部朝房小憩。寅初二刻，宫门辟，遂入递折，还至朝房小憩。卯初三刻，复入，候旨于出入贤良门东之朝房。卯正，传出召见第六起，与锡龄、鹤汀、富呢牙杭阿容斋、支清彦少鹤，入勤政殿西小门外之南房候宣。甫交辰初，宣入勤政殿赐见。御座居中，跪在军机第三垫之西面，向东北免冠叩头，奏云：臣王庆云叩谢皇上天恩。

上问：汝福建那一府？

奏云：臣福州府人。

又问县，奏云：闽县。

上问：是原籍否？

奏云：原籍就是福建。

又问居处，奏云：城内。

上问：福建省城有啖咭喇，他人并不多，只有八九个人，汝看见否？

奏云：臣不大看见他。

^① 王传璨：《王文勤公年谱》。

上云：自然。汝见他作什么。

言至此，似有慨然之色。

又问：他所居何处？是城内城外？

奏云：在乌石山。

问：他所居是他自己起盖，抑系我们给他住的，或是租民房住的？

奏云：他山上住在庙里。

上问：汝是升侍讲学士来谢恩的？

奏云：是。

上问：汝今年四十几岁？

奏云：臣五十。

上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实难为汝。这题目谁不懂得，但做得不好的甚多。汝三样俱好，自然要把汝取在一等第一。

时瞻天颜，似有悦喜惊讶之意，臣伏地叩头。

上又云：汝五十岁尚能如此做得好，实难为汝。

上问：朕记得放汝试差、学差，是那一省？

臣叩头奏：蒙皇上天恩，道光十四年放过广西试差。

上又问学差。

奏云：十七年放贵州学差。

上云：汝当时是编修。

奏云：是。

又问：汝得过日讲起居注官否？

奏云：未。臣去年蒙派文渊阁校理。

上云：往后讲官缺，自要出来引见。

奏云：是。

上云：翰林衙门无甚事，向后可以照旧用功。

奏云：是。

上倚佩，臣叩头，冠起，退出。

正是因为此次翰詹大考成绩突出，王庆云开始受到关注和提升，由侍读学士、侍讲学士、通政使司副使、詹事府詹事，而顺天府尹、户部